现代词学的研究价值、现状及方法反思

陈水云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现代词学是一块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从中国词学发展史的角度,从传统到现代对接的角度,现代词学都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当前,关于现代词学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太多,大多以少数几位成就比较突出的大家的个案分析作为主要的研究方向,研究水平还停留在史实还原的阶段,缺少宏观研究成果。这一领域有着广泛的发展空间,能引发出许多重要的理论话题,比如"大家"的魅力、家学的传承、学校的影响、学术的进步等等。

关键词:中国词学;现代学术;研究价值;方法反思
中图分类号:I207.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79(2015)02-0066-07

Reflection on the Research Value, Current Situation, and Methodology of Modern Ci-poetics

CHEN Shuiyun
(School of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2, China)

Abstract: Modern Ci-poetics, a virgin land lacking of exploitation, is of great research value either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of Chinese Ci study or integrating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Presently, research results on modern Ci-poetics are not sufficient. Research areas are limited in case studies, focusing on works of few scholars with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nd the level of study stays at the stage of restoring history, lacking of macro-study findings. Actually, there is a broader space for development in the research area of modern Ci-poetics, which can cause quite a lot of important topics such as the charm of "great masters", the inheritance of family learning traditions, the influence of school, the academic progresses, etc.

Key words: Chinese Ci-poetics; modern academic; research value; methodological reflection

中华民族一直有着浓厚的贵古贱今观念,在词学研究领域也表现得比较突出。从词史角度看,我们对于唐宋词关注较多,却对明清词有所忽视;从词学角度看,我们对于明清词学关注较多,而于现代词学重视不够;从总集的编纂看,我们有《全唐五代词》、《全金元词》、《全明词》、《全清词》,却惟独没有现代词集的汇编;从词话的汇辑看,唐圭璋《词话丛编》收录词话大多为明清词话,现代词话却是廖廖可数。笔者近年来从事现代词学的研究,接触了大量的现代词学史料,搜集了数量可观的现代词学研究资料,从过去忽视的现代词学研究领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学术现象,总结出一些特殊的理论话题,在这里提出来以就教方家。

收稿日期:2014-11-1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词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编号:09YJA751069)
作者简介:陈水云(1964-),男,湖北武穴人,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词学。

一、现代词学的研究价值

关于现代词学，我们确定的时间界线是 1908 – 1949，约 40 年的时间。之所以以 1908 年为起点，是以王国维《人间词话》发表为标志; 1949 年是政治的分水岭，也是学术的分水岭。这 40 年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 40 年，古与今、新与旧、中与西的冲突表现得尤其突出，它既是对传统学术的继承，也是对现代学术的建构，我们在今天所认同的一些学术传统正是在这个时期确立起来的，我们现在所谈的词学传统也主要创建在这个时期。

说起现代词学的重要，是因为它是我们与传统之间的联结点。传统词学到了清末已有集大成之势，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的词学都有这种倾向，是对清代以来浙西派、常州派的集大成，也是对自明代以来婉约与豪放之争的集大成，一千年来的词学传统到了他们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综合，他们虽各有偏嗜却并不抱残守缺，而是积极吸纳诸家之长，并形成自己的创作特色和理论主张。更值得注意的，他们特别注意传统的传授，王鹏运先后邀朱祖谋、况周颐入咫村词社就是这种表现，而现代词坛的薪火也是由朱祖谋、况周颐点燃起来的，朱祖谋对吴梅、陈洵、龙榆生、夏承焘、杨铁夫、叶恭绰有影响，毋庸置疑，其实况周颐对现代词学亦影响深远，夏敬观、赵尊岳、刘永济、陈运彰都直接或间接师从于况周颐。也就是说他们培养了传统词学的“传人”，也播洒了现代词学的“种子”。施议对先生曾把二十世纪词学队伍划分为五代人，第一代是清末四大家，第二代是陈洵、吴梅、夏敬观、刘永济、叶恭绰、陈匪石等，第三代则是夏承焘、唐圭璋、赵尊岳、龙榆生、詹安泰、李冰若等，他对第四代的划分主要以大陆为中心，对港台地区则关注不够，这里姑且不论。[1] 而第二或三代传人正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现代词学的开创者，也是现代词学界的中流砥柱，他们奉献给现代学界的重要成果，如《词学通论》、《唐宋词人年谱》、《全宋词》、《明词汇刊》、《词学研究》等，成为现代词学的“标志”。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对传统有继承更有发展，所谓继承就是尊重古代的词学传统，所谓发展就是运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传统，使中国词学走向了现代，让传统在现代依然能焕发出熠熠光芒，像吴梅、王易、龙榆生、刘永济等人的研究都具有这一特色，他们的研究把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起来，亦即传统与现代在他们那里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他们从文献整理、现代学科体系的建构、现代研究方法的开拓等方面，基本规划了 20 世纪词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和重要手段，如果没有他们创建的现代学术范式和学科体系，也就没有我们今天所从事的词学研究事业，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大体上是对吴梅、刘永济、胡云翼、夏承焘、唐圭璋等的继承，当然也会随着时代的进步有一些局部的调整和拓展，但总体上还未能溢出他们所规划的研究范围和他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

说起现代词学的重要，还因为它依然沾溉着我们今天这些从事词学研究的学术新人，他们的研究著作已成为我们从事词学研究的入门指南，我们今天的研究都是在现代词学的基础上展开的。从文献整理角度看，像张璋、黄畬编《全唐五代词》、曾昭岷等编《全唐五代词》都利用了林大椿先生在 30 年代汇辑而成的《唐五代词》，唐圭璋编、王仲闻审订《全宋词》也是在 40 年代研究的基础上展开的，张璋、饶宗颐编纂《全明词》更是充分利用了赵尊岳明词整理的既有成果，据有关专家介绍，赵尊岳一直有编纂“全明词”的设想，但因条件的限制未能付诸行动，后来，他把自己多年搜集和研究所得传授给饶宗颐，这成为《全明词》编纂的最初基础。虽然《全清词》的编纂是重新启灶，但叶恭绰的《全清词钞》也为它的编纂工作打下了较好的基础。从学科规划看，我们对词学的研究对象有各种相关的思考，也是对现代词学有关思考的进一步深化，在上个世纪 20 年代已有学者在思考相关问题，有以填词为词学的，有以治词为词学的，前者指向创作，后者指向研究，何取何舍？龙榆生先生在 40 年代撰写《词学研究之商榷》一文，指出应该严格区别“填词”与“词学”：“取唐宋以来之燕乐杂曲，依其节拍而就实之以文字，谓之‘填词’; 推求各曲调表情之缓急、悲欢与体制渊源之流变，乃至各作者利病得失之所由，谓之‘词学’。”[2] 正是在这样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现代词学研究的八项内容: 图谱之学、词乐之学、词韵之学、词史之学、校勘之学、声调之学、批评之学、目录之学，这一构想是在传统基础上适应新时代需要而提出来的，“算是把旧学与新学、基础与上层都兼顾到了”。[3](p17) 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也有学者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如唐圭璋(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

论)、[4] 吴熊和(词源、词体、词调、词派、词籍、词乐)、[5] 刘扬忠(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的声情、词人传记、词集版本、词集校勘、词学典籍目录、词集笺注、词学辑佚、词学评论)的有关设想,也是以龙榆生的构想为基础来建构学科体系的。从研究方法来看,我们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历史还原与现代阐释两个方向,历史还原就是以尊重历史的态度,用传统朴学的方法,对一些文学史现象做忠实而客观的还原工作,比如版本校勘、词籍提要、作品考证、文本笺注、词人年谱等;所谓现代阐释就是运用先进的西方理论对中国词史进行新的建构,比如历史与美学的批评方法,女性、民族、白话的研究视角。这两种路数也正是由现代词学研究所开创的,属于前者有夏承焘《唐宋词人年谱》、梁启勋《稼轩词疏证》、唐圭璋《全宋词》、李冰若《花间集评注》等;属于后者有胡云翼的《中国词史大纲》、冯沅君《中国诗史》、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缪钺《中国史上之民族词人》等,今天无论在研究方法上有何创新,基本不出上述两个方面。

然而,现代词学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承上启下,而且还在于它是一种有别于旧词学的"新词学"。所谓"旧词学",是以创作为基本方向,以传统诗教为创作原则,以源流体制为研究内容,以词话词籍评点为主要研究手段。而"新词学"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都大大地突破了"旧词学"的理论格局。对此,刘扬忠先生有比较精辟的论述,他说:

我认为,二十世纪的新词学并不是传统词学自然发展的结果。恰恰相反,我这里要强调的是,新词学是本世纪开头 30 多年新文化思潮冲击旧词学,使之发生裂变的产物,而决不是传统词学的传宗接代式的延伸或复制。挟带着新思想、新观念和新方法闯进世纪初的词坛,给这门古老的学问带来新面貌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俞平伯等一批受过西方薰陶的新派人物。同传统的旧式的词学家相比较,这些新派人物思维方式不同,治学路子不同,因而面对同样的研究对象所得的结论也大不一样。他们发表的那些在当时激起轩然大波的专著和文章,所代表的是一种新的学术方向,所提供的是一种新的学术范式。[6]

如果说"清末四大家"的研究尚属旧词学的话,那么在 30、40 年代发展起来的词学研究便是"新词学"了。有人提出现代词学研究队伍有"传统派"与"现代派",前者以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为代表,后者以俞平伯、胡云翼、冯沅君为代表。这样的提法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先天的偏见性,我们认为这两派都应该属于"新词学",只是在研究方法上,有的是用历史还原法,有的是用现代阐释法,把他们称之为现代词学的两个学术流派是可以的,但以"传统"与"现代"来定义他们有些欠妥,我倒是觉得曾大兴先生的提法比较客观相对合理,即在 20 世纪学术界的确存在两个学术流派——"南派"和"北派",[7] 他们在词学渊源、词学思想、治词路子、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的差异,但他们都是在新时代运用现代的理论进行学术研究的,已不再以旧时代的诗教观为其指导原则,而是以真情纯美的新观念看待词史,在研究方法上也以科学的实证法为其努力的方向,他们的研究都应该属于"新词学"。

二、现代词学的研究现状及方法

我们认为,现代词学是对传统文化的现代研究,是对传统词学的变革和创新,无论是在思想资源上还是在言说方式上,当然无法脱离千年以来形成的词学传统。但是,现代词学作为一种新词学,它在本质上与传统词学已划清界线,它是在现代视野下开展的学术研究,因此,在明确现代词学的必要性和学理性基础上,还要进一步探索现代词学研究的历史和路径。

关于现代词学的研究现状,已有学者作了比较系统的回顾与清理,大致说来,分为宏观与微观两个方面,从宏观方面看,涉及到现代词学的内涵、范畴、分期等问题;从微观方面看,主要是讨论著名词学家的学术成就。[8] 这些研究对于推动现代词学研究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其存在的不足也是较为明显的,即大多以词学家为切入点,重点分析王国维、吴梅、胡适、梁启超、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等大家的思想观念,这样固然能梳理相关线索,彰显现代词学的某些特色,但现代词学毕竟不同于传统词学,我们所面对的研究资料极为丰富,传统的只以大家名家带动历史的做法有一定的局限性,是不是可以根据实际作一些新的探索?目前也有学者作了新的尝试,如傅宇斌从《词学季刊》考察三十年代的词坛生态和词学研究;秦惠娟从词学理论的新旧转换考察了现代词学的新特质;王湘华从研究方法

的角度考察了晚清民国词学在词籍校勘上所取得的成就，这些对于现代词学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开拓都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经过近几年的研究探索，我们认为可从大家、家族、教育、学术等方面找到现代词学研究的一些“增长点”。首先，对于“大家”的研究，在现有成果的基础上进行视角转换，从他们对现代词学的影响入手，讨论他们为现代词坛贡献了哪些新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于现代词学建设所发生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大家”的意义，并不在于他们的观点有多么新颖，他们的方法有多么科学，而在于他们的思想和方法所散发出来的魅力。他们对于历史的贡献，是中国词学在他们的手中完成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过渡与转型，比如朱祖谋的意义在于他作为民初词坛领袖，培养了一大批词学研究新人；王国维的意义在于他引进西方的学术理念对传统词学进行了实质性的“改造”；胡适的意义则在他把传统词学的改造作为一种学术事业来对待，并在他的影响下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流派——“胡适派”（北派）。其次，从家族的角度观察现代词学的转型，也是过去研究所忽略的，如果尝试通过几个有代表性的文化世家的个案分析，相信能找到一些传统研究所未能发现的“节点”。众所周知，晚清民初处在中国社会转型之际，但文化的传衍并没有随着政治的变迁而发生太多变化，相反，一些在晚清时期成熟发展起来的新兴文化家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我们过去注意到义宁陈氏对于现代学术建设的重大影响，无锡钱氏对于现代诗学建设的突出贡献，其实文化世家对现代词学的发展也发挥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像德清俞氏和新会梁氏就是这样典型的文化望族，即使是江山刘氏对于中国词学的现代转型也功不可没。① 第三，随着高等教育的迅猛发展，高等学府成了现代学术的发源地，现代词学也在这里生根发芽起来。实事求是地说，高等学校是现代学者最佳的活动空间，一方面他们把自己的研究心得传授给学生，并在师生互动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学术水平，也把自己的研究心得迅速地转化为学术成果；另一方面，民国大学良好的育人环境，包括生活待遇的优裕，时间相对自由和闲适，政治环境相对宽松，有利于他们自由的思考和思想的交流。这里还是文人比较集中的地方，对于他们来说雅集和唱和也极为便利，因此，在南京中央大学有师生之间的“潜社”唱和，也有校内师生与校外文人之间的“如社”互动。② 还有一点，大学历来是学术研究的重镇，设置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创办学术期刊，都对推进学术研究意义重大。现代词学史上一些重要的学术论文，就是由这些高校的师生撰写并发表在相关的学术刊物上，这些不但活跃了高等学府学术研究的空气，也培养了一大批现代词学研究新人。③ 第四，现代词学的进步是与现代学术的发展分不开的，中国学术到了清末民初之际出现了中学与西学之争，何优何劣？遽难论定，但外来学术对传统学术的冲击在所难免，问题的关键是中国学术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应对外来学术？通过考察现代学术史，我们注意到现代的学术大师们通过创造性的转换，将传统与现代对接，在乾嘉朴学的基础上推出顺应时代发展需求的“新朴学”，从乾嘉学者那里而来的音韵、训诂、校勘方法，与自西方泊来的实证方法相结合，成为一种具有精密而纯粹之特色的新型学术——“考证学”。这一方法在王鹏运、朱祖谋、郑文焯等的词学研究上已有应用，到王国维，通过《词录》、《清真先生遗事》、《唐五代二十一家词辑》，并为每篇词籍撰写跋语，交待版本源流，考订作者仕履，辨析作品真伪，将这一研究方法进一步完善。④ 然后，在孙人和、龙榆生、夏承焘、唐圭璋、赵万里、赵尊岳、陈乃乾、叶恭绰等学者身上开花结果，先后推出了世纪经典——《全宋词》、《词话丛编》、《明词汇刊》、《清名家词》、《全清词钞》、《唐宋词人年谱》、《东坡乐府笺》、《梦窗词全集笺释》等。

还有，我们过去比较注重词学研究的内部规律，却在不经意中忽略了时代思潮对于词学研究的影响。在现代思想史上，在不同时期曾经出现过不同的社会思潮，如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在这些思潮的推动下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流派，如国粹派、学衡派、西化派，这些文化思潮或流派对于现代词学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比如，南社词人与国粹派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在文学观念上也就特别

---

① 分别见拙文《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俞平伯家族的词学史》（《社会科学辑刊》2005 年第 1 期）、《广东新会梁氏与中国现代词学》（《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 年第 2 期）、《浙江江山刘氏与晚清民初词学》（《浙江大学学报》2012 年第 4 期）。

② 参见拙文《东南大学与现代词学》，《文学评论丛刊》第 15 卷第 2 期（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4 年 6 月）。

③ 参见拙文《无锡国专与现代词学》（《江南大学学报》2011 年第 6 期）、《清华大学与中国现代词学》（台湾《汉学研究通讯》2012 年第 3 期）。

④ 参见拙文《赵万里词学研究业绩之平议》，《国学学刊》2014 年第 4 期。

推崇宋诗派与常州派。柳亚子说“在清末的时候,本来是盛行北宋诗(指同光体诗人)和南宋词(指清末四大家)的,我却偏偏要独持异议。……我说,讲到南宋的词家除了李清照是女子外,论男性只有辛幼安是可儿,梦窗七宝楼台,拆下来不成片断,何足道哉!这句话不要紧,却惹恼了庞蘖子和蔡哲夫。蘖子是词学专家,南宋的正统派,哲夫却夹七夹八地喜欢发表自己的主张,于是他们便和我争论起来。”[9](p14) 这里讲到南社成员内部的分歧,但也说明国粹主义思潮对于民初词学的影响。在五四前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倡导白话文学,谈白话成为一时之风尚,白话文学思潮也进入到词学研究领域。胡适编选的《词选》,实际上是一部白话词选,他的《国语文学史》也是一部白话文学史,对于词史的叙述以白话作为词人词作的入史标准。在这一时代思潮影响下,先后有凌善清《历代白话词选》(上海大东书局 1924 年版)、张友鹤编《历代女子白话词选》(文明书局 1926 年版)、谢秋萍编《吴藻女士的白话词》(上海亚细亚书局 1930 年版)、张友鹤、吴廉铭编《注释白话词选》(中华书局 1936 年版)出版问出。晚清以来,女性主义思潮特别兴盛,女权主义风行一时,《妇女时报》、《神州女报》、《女子世界》、《妇女杂志》等报刊先后创办,在这些刊物上不但有女性诗词的发表,还刊载了一系列的女性词话或闺秀词话,这也启示了有的学者从性别的角度看词史,关注女性词人,编辑女性词选,有徐珂的《历代闺秀词集释》(商务印书馆 1926 年版)、胡云翼的《女性词选》(上海亚细亚书局 1926 年版)、李辉群《历代女子词选》(中华书局 1935 年版)、李白英的《中国历代女子词选》(光华书局 1932 年版)等。像这样的社会思潮还有民族主义,近代中华民族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遭遇外晦是一个世纪无法摆脱的阴影,亡国、抗战、救亡成为大家共同关心之话题。民族主义思潮在词学研究上有比较直接的表现,在三四十年代对于民族词人的讨论尤为热烈,关于岳飞、辛弃疾、张孝祥、陈亮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他们分别被冠以“英雄词人”、“爱国词人”、“民族词人”的称号,在这一思潮推动下,缪钺还撰有《中国历史上之民族词人》的专书。学术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从此可见一斑,但在国家危亡之关头,以学术救国未必不是可取的路径之一。[10]

此外,现代出版传媒也是推动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因素。一般说来,词在唐宋时期以歌妓传唱为主,明清时期则以图书流通为主,传统词学的传媒经历了一个由歌妓传唱到图书流通的过程,不过,明清时期图书的出版流通速度比较慢,一本书从写作到出版多则十余年,少则也有数年,有的甚至是在词人去世后由其后人编辑出版的,这对扩大词人在当时的影响是有较大局限性的,所以,明清时期词人主要通过结社唱和的方法来增强其影响力。[11] 而在近现代随着西方先进印刷技术的引进,图书出版流通的速度逐渐加快了,一些词人会把自己的词学研究成果交给出版社出版,一些有经济实力者也会自行刻印词学典籍或研究成果,像唐圭璋的《全宋词》和赵尊岳的《明词汇刊》都是自已印行出版的,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一些词人或学者会借助大学印行讲义的形式,印发自己的词学研究成果,像刘永济的《诵帚堪词选》、《诵帚堪词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社会上流传的。一般说来,通过正规出版社出版的词籍或专著,比较容易在社会上产生影响力,所以,当时的词人或学者主要采取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出版社出版的方式。我们知道,在近现代,上海的出版业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据有关资料统计,从 1840 年到 1949 年的 100 多年时间里,先后有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多达 250 余家,我们现今能见到的一些重要词学研究著作,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由设在上海的出版社出版的,如扫叶山房、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北新书局等,上海成为现代学术的出版中心和现代词学的传播中心。当然,现代传媒的另一重要形式——报刊杂志,对现代词学的传播也产生过积极的推动作用,近现代最有影响的两部词话《人间词话》、《蕙风词话》首先都是刊发在《国粹学报》上的,大量的南社文人词话也主要是发表在由他们自己主编的报刊上的,我便在南社文人主编的《新中华》、《民国日报》、《小说林》、《民权素》、《妇女杂志》等报刊辑得词话二十余种。而在 30、40 年代由龙榆生先生主编的《词学季刊》、《同声月刊》更成为现代词学研究的两面“旗帜”,它把当时星散在南北词坛的耆宿和新人紧紧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从它的作者队伍看,正如施议对先生所说是由第二代、第三代传人组成,这两代人是现代词学研究的中坚力量,他们撑开了现代词学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这两本词学期刊在体例上多所创新,既有稀有文献的刊载,也有研究成果的发表,还有新撰词作的推出,并不定期发布新近词籍出版信息。较之图书出版而言,学术期刊及时发布最新学术成果,不仅提高了作者的影响力,而且

也促成了学术讨论的良性互动，像《词学季刊》上刊登的有关蒋春霖之死因的讨论，关于刘子庚先生遗著的通讯，关于白石词谱的讨论，对相关问题的最终解决提供了可信的数据。学术的出版与期刊的创办也是推动中国词学走向现代的一个非常重要因素。

三、研究方法的反思及发展前景

通过以上描述，对现代词学相关问题，我们或许有一些新的印象。由此，我们会对过去相关研究展开反思，对于现代词学研究，虽然也有《中国词学史》、《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20 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词学卷)、《20 世纪词学名家研究》等，涉及到现代词学的部分内容，但它们大多是以评传的方式，对一些著名词学家的思想观点归纳和总结，这样的研究路数或者说切入点，不能说是全面反映了现代词学研究的丰富多样性，而且也忽略了现代词学所呈现出来的重大问题，因为，在现代已不是一两个大家一统学术界的格局，而是由众多学者围绕相同的议题展开讨论并推进学术进步的新时代。这种以大家带动历史的学术思路，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大家名家代表时代的思维模式所致，也是我们对史料的解读和分析存在着认识思维上的偏见所致，对于现代词学在史料的搜集与分析上必须重新认识。

第一，历史与细节。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现代词学，是一种过去的学术，“过去”就是曾经的“现在”，是一种鲜活生动的历史存在。“鲜活”，就是由许多具体的可以感知的细节组成，作为历史研究者，其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鲜活”呈现出来，也就是说历史研究以追求细节的真实为目标，有了细节才能还原历史，说明真相，这也是当前史学界所倡导的社会生活史研究方法。我始终坚信，历史不只是名家的简单相串，特殊性不能取代一般性，一般性就是“鲜活”的生活真实，我们一定要回到历史的场景里去观看当时人的活动，不能因为史料的少于记载，就忽略了历史的一般性。的确，大家名家是一个时期思想的“标志”，却不能涵盖一切，历史的进步体现在具体的生活细节上，一定要摒弃以名家研究取代历史的做法。如何再现一般性，再现细节的真实？我想最有效的办法是大量的接触原始材料，广泛的材料阅读会让我们回到历史的场景中，看到生动鲜活的历史细节。比如在 30 年代的上海，有一场由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的讨论，这一场讨论是五四时期胡适等人有关讨论的继续，在传统的诗歌、戏剧革命之外，对于词的形式与内容进行的革命，其参与的人物有余慕陶、褚问鹃、陈钟凡、龙榆生、柳亚子、郑振铎、董每勘等，只是因为鲁迅对曾今可有批评，所以，一直以来人们对这次讨论略而不谈，但它在当时却是在词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2]

第二，史料与理论。当前，我们的研究有些过于迷信理论，认为只有新理论才会有新的学术观点。其实，史料对于理论而言它的价值具有恒久性，我们觉得，对于文学史学科而言，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理论的建设上，还不如脚踏实地在史料的搜集上多花些时间，新史料的发现会让我们改变偏见。比如对 20 世纪之初的词学，人们过去关注较多的是王国维、梁启超、胡适这些新派人物，却忽略了一个紧承清末四大家而来的南社文人群体，他们在当时的影响力亦不逊色于上述新派理论家，而且通过他们把清末词学与民初词学之间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了。在过去，我们过多地关注大家名家，对于其他一些学者往往视而不见，如果我们能注意到大家名家之外的学者和词人，在数据的关注度上侧重于一些非大家非名家，我们会发现现代词学是如此的丰富多彩，中国词学从传统向现代转换的进程，也是一个众人添火的工作，我在现代词学研究过程中新发现许多学者和著述，比如王蕴章的《词学》、孙人和的《续修四库词籍提要》、徐兴业的《清词研究》、《清代词学批评家述评》、夏仁虎的《枝巢四述》“论词”等。我们认为，新史料的发现就是新观点的发现，传统的研究方法讲究以材料说话，就是这层意思。现在大家觉得理论具有创新性，其实，史料的发现与理论的创新并不矛盾，理论的言说需要史料的支撑，史料能比较准确地说明观点。比如，我们过去总以为胡适对旧文学是否定的，但通过读《胡适日记》，我们发现胡适理论的立足点是白话文学，支撑他这一理论的并不是来自西方的文学史，他是建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认识基础上，他把乐府、词曲、小说都看作是白话文学，词曲在他的心目中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不但编有《词选》一书，还在《国语文学史》中对宋词给予较高的评价，作为文学史发展链条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对《胡适日记》的通读，怎么能正确理解胡适表述上的矛盾性呢？还有俞平伯，我们过去一直把他作为现代新诗的代表，他是五四时期《新潮》社的重要成员，但通过了解他的家学渊源，了解他接受教育的

背景,才知道俞平伯为什么会走上词学研究之路,原来他的曾祖、他的父亲都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词人,他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又受到黄侃的影响,正因为这样他有过比较成功的填词经历,还在清华大学教授过词学,并先后推出《清真词释》、《读词偶记》、《词课示例》等著作,这些使他的词学研究带有比较明显的传统色彩。

第三,知识与思想。对于史料的重视是学术研究的出发点,这是基础,却不是目的,我们从事现代词学研究,是要通过它来展现我们的思想智慧,特别是我们对于前人已有认识的超越和进步。但是,当前的研究却存在着唯知识论的倾向,某些著述存在着严重的史料堆积的毛病,只是满足于对"知识"的掌握,忽视了"知识"作为人类进步的标志,是以"思想"的创新为其价值体现的首要条件,也就是说"知识"只是人类"思想"进步的一个阶梯而已。可是,有些人却主张回到乾嘉时代,试图以知识取代思想,"由考覈以通乎性与天道",这实际上是试图以知识吞并思想,表现出一种根深蒂固的知识优先的理念,结果是将他们的全部精力耗费在史料的搜集上。其实,知识与思想在主客观两方面都有不同的品性,知识的特点在它的正确性和恒定性,人们对知识的了解在求博求实求稳,对知识的掌握主要靠的是主体的记忆力;相反,思想的特点在它的新颖性和时代性,人们对思想的要求在求深求专求新,对新思想的探求主要依赖的是主体的辨识力和创造力。作为社会生存的手段,知识是人类必需的,但推动人类进步的却是思想的创新,人类的天性亦在它的不断求新,在思想的创新过程中促进了自身的进化,也推动了社会的进步,所以,对新思想的探求是人类的最根本性特征,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亦在创新,对于现代词学的研究也是这样。在已有史料清理基础上,适当进行理论分析,提炼出一些带规律性的认识,展示我们这个时代人类认识水平的深度和广度,使我们的研究打上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思想标记。

总之,从基本史料出发,从展现我们时代思想智慧的高度,我们认为现代词学研究学术空间广阔,期待有更多的学者进入这一矿藏丰富且尚未完全开发的处女地。

参考文献:

[1] 施议对. 方笔与圆笔——刘永济与中国当代词学[J]. 中国韵文学刊,2004,(1).
[2] 龙榆生. 词学研究之商榷[J]. 词学季刊,第一卷第4号(1934年4月).
[3] 刘扬忠. 宋词研究之路[M]. 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
[4] 唐圭璋,金启华. 历代词学研究述略[M]. 词学,1981,(1).
[5] 吴熊和. 唐宋词通论[J].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
[6] 严迪昌,刘扬忠,钟振振,王兆鹏. 传承、建构、展望——关于二十世纪词学研究的对话[J]. 文学遗产,1999,(3).
[7] 曾大兴. 二十世纪"南派词学"与"北派词学"素描[J]. 中国韵文学刊,2011,(2).
[8] 傅宇斌. 现代词学的研究现状及展望[J]. 中国韵文学刊,2011,(1).
[9] 柳亚子. 南社纪略[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0] 汪 东. 国难教育中发挥词学的新标准[J]. 文艺月刊,第9卷第2期(1936).
[11] 朱惠国. 论传播媒介对词学研究的影响[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5,(2).
[12] 倪春军.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J]. 兰州大学学报,2012,(1).

(责任编辑:张立荣)